

中国古代史史料学

(修订本)

陈高华 陈智超 等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史史料学/陈高华等著. —修订本.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6.9

ISBN 7-80696-318-9

I. 中... II. 陈... III. 史料学—中国—古代

IV. K2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3861 号

中国古代史史料学

陈高华 陈智超 等/著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http://www.tjabc.net>

E-mail: tjgj@tjabc.net

天津市津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29.25 字数 430000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80696-318-9

定 价: 42.80 元

前 言

理论是历史研究的指导,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是历史研究的正确指导。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系统的、充分的、经过检验的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坚实基础。详细地占有史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从这些史料中得出正确的结论,这便是研究历史的唯一科学的方法。

随着人类创造历史的活动不断深入,人类对历史的认识不断深化,人们对史料的观念也不断变化,史料的范围越来越扩大。不但专门史籍可以作为史料,其他文献也可以作为史料;不但有意识的记录可以作为史料,无意识的记录也可以作为史料;不但文字记录可以作为史料,实物材料(如文化遗存)和口头材料(如传说)也可以作为史料。

史料总是不可避免地带有产生它的那个时代的特点,有它的历史局限性。文字史料更必然打上记录史料的个人和集团的阶级烙印。本书论述的范围是中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当时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垄断了文化,所有的文字史料都出于他们之手,充满了剥削阶级的偏见。这给后人研究这一段历史带来了许多困难。只有在历史唯物论的指导下,对史料进行科学的搜集、鉴别和整理,才能加以合理的利用。

史科学就是研究史料的搜集、鉴别和运用的科学,是历史科学的一个分支。史料学可大体区别为两类:一类研究搜集、鉴别和运用史料的一般规律和方法,可称为史料学通论;另一类研究某一历史时期或某一史学领域史料的来源、价值和利用,可称为具体的史料学。

我们这本《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属于后一类,其范围上起有文字史料的商代,下迄鸦片战争前的清代前期,即中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中国古代的文献浩如烟海,考古发现又层出不穷,初学者

常苦于不得其门而入。我们编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为学习中国古代史的同志介绍有关史料的基本知识。本书的编写采取统一体例、分头执笔的办法。各章的划分及执笔的同志分别是:第一章,商殷,齐文心。第二章,西周春秋战国,刘起钊。第三章,秦汉,吴树平。第四章,魏晋南北朝,张泽咸;这一章的二、三两节不少地方采用了唐长孺先生讲稿的观点。第五章,隋唐五代,张泽咸。第六章,宋代,陈智超。第七章,辽金西夏,陈智超、陈高华。第八章,元代,陈高华。第九章,明代,曹贵林、郑克晟。第十章,清代,郭松义。

就我们所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版过一部中国古代史史料学。我们的工作属于草创,没有前人系统的经验可以借鉴;再加上水平有限,这本书肯定存在不少缺点错误。我们愿借本书出版的机会,听取大家的意见。同时,正因为工作属于草创,更显出它的迫切性。我们希望这本书对广大有志于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中青年同志,能有所帮助。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参考吸收了史学界许多同志的研究成果,谨此表示谢意。

陈高华 陈智超

一九八一年七月

修 订 本 前 言

《中国古代史史料学》是一部史学入门书,主要面向喜爱中国古代文史的青年人,也可供研究者和教师参考。出版以后,很多读者给予我们热情的鼓励,不少大学将本书列为教材或参考资料。我们谨向关心此书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出版至今已二十余年。在此期间,不断有新史料发现,古籍整理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我们这次修订,一是改正原有的一些讹误,二是力求吸收史料学的最新成果。由于见闻所限,必定有不足之处,期待着读者的批评。

本书第二章《西周春秋战国史史料》的修订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吴锐副研究员的帮助。本书第九章《明史史料》的修订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封越健研究员的帮助下共同完成的,还曾得到历史所何龄修研究员的帮助。谨向他们表示感谢。

陈高华 陈智超

2006年7月

目 录

第一章 商殷史史料	齐文心(1)
第一节 概况	(1)
第二节 传世甲骨文的著录书	(7)
第三节 科学发掘的甲骨文	(22)
第四节 《甲骨文合集》	(28)
第二章 西周春秋战国史史料	刘起钊(35)
第一节 概况	(35)
第二节 西周至战国文献史料	(43)
第三节 汉代以下有关周代的文献史料	(52)
第四节 清代对周代文献的整理研究资料	(56)
第五节 有关周代的考古文物史料	(60)
第三章 秦汉史史料	吴树平(71)
第一节 概况	(71)
第二节 基本史料	(75)
第三节 其他文献史料	(88)
第四节 考古资料	(98)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史史料	张泽咸(106)
第一节 史料特点	(106)
第二节 以正史为核心的基本史料	(110)
第三节 其他史料	(138)
第五章 隋唐五代史史料	张泽咸(161)
第一节 概况	(161)
第二节 多种体裁的基本史料书	(167)
第三节 丰富多彩的其他资料	(201)

第六章 宋史史料	陈智超(223)
第一节 概况	(223)
第二节 基本史料	(227)
第三节 一般史料	(243)
第七章 辽金西夏史史料	陈智超 陈高华(260)
第一节 辽史史料	(260)
第二节 金史史料	(269)
第三节 西夏史史料	(281)
第八章 元史史料	陈高华(286)
第一节 概况	(286)
第二节 基本史料	(288)
第三节 其他史料	(299)
第四节 国外史料	(317)
第五节 文物考古资料	(323)
第九章 明史史料	曹贵林 郑克晟(324)
第一节 概况	(324)
第二节 基本史料	(325)
第三节 其他史料	(339)
第十章 清史史料	郭松义(409)
第一节 概况	(409)
第二节 档案资料	(412)
第三节 基本史料	(424)
第四节 其他史料	(437)
第五节 国外资料	(452)

第一章 商殷史史料

第一节 概 况

商代是我国历史上奴隶制时代的一个强盛的王朝。从商汤灭夏至纣亡,传十七世三十一王^①,约当公元前17世纪至前11世纪。商代的王都屡次迁徙,到盘庚时,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西北),因此商代后期被称为“殷”。以盘庚迁殷为界限,商代的历史可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后期共经八代十二王,二百七十三年,这是商代历史上重要的时期。这期间王室加强了统治,殷人的统治区域和文化影响从黄河流域伸展到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青铜文化获得了高度的发展。

随着奴隶主阶级统治的加强,在殷王朝的国家机构里设置了一些精通文字,掌管文书的史官,甲骨文中的“卜人”,可能就是史官的一种。他们当时的记载,就是我国最早的文字史料。根据古书所载,商代本来有丰富的史料。《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说明殷人曾有记载汤革夏命的“典”、“册”。当时的“典”、“册”是刻写在竹木之上的,可惜由于年代久远,早已荡然无存了。

商代的文献资料,流传下来的甚少。春秋末年的孔子对于殷代文献缺乏的情况已经在发着慨叹,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② 孔子距殷时代未远,已感到可信赖的史料不足,对于距孔子两千多年的当代来说,自然更无足够的文献可徵了。幸运的是,在《尚

① 三十一王为:大乙(汤)、太丁、外丙、中壬、太甲、沃丁、太庚,小甲、雍己、太戊、中丁、外壬、河亶甲、祖乙(中宗)、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盘庚、小辛、小乙、武丁(高宗)、祖庚、祖甲、廩辛、康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纣)。

② 《论语·八佾》。

书》、《诗经》等古籍中,还保存了一些商代的文献史料,尽管这些史料不免经过后人的加工窜改,使用起来还需下一番分析鉴别的工夫,但是它们有如凤毛麟角,仍然是值得珍视的。

《尚书》中的《商书》共五篇:《汤誓》、《盘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和《微子》。

《汤誓》是汤伐夏桀时的誓师之词。关于汤伐夏桀的事,《诗经·商颂》以及汉代的《书序》、《史记·殷本纪》中都有记载。其内容应有原始的史料根据,但《汤誓》文字比较浅显,像文中的“尔”、“庶”、“天”等都是周人的用语。其写定的时间较晚,应是战国时代的作品。

《盘庚》分上、中、下三篇,是殷王盘庚在迁都前后对臣民的告诫,为当时史臣所记。全文共 1283 字,在《商书》各篇中文字最长,写定的时代最早,史料价值较高。《盘庚》三篇的次序在流传中有所颠倒。第一篇(原中篇)是盘庚在即将迁殷时对臣民所作的动员讲话;第二篇(原下篇)是既迁之后,对官员百姓的告诫;第三篇(原上篇)是迁定一段时间之后,因“民不适有居”,盘庚通过贵戚大臣向臣民的安抚讲话和对官员们的告诫。这三篇一般学者认为是殷代的文献,但在文字上也不免经过周人的加工润色。

《高宗彤日》的内容,是记殷高宗武丁在祭祀成汤时有飞雉登鼎耳鸣叫,大臣祖己借机会对王进行训诫。此事在《书序》和《史记·殷本纪》中都有记载。以鸣鸟为不祥之兆和殷人的观念吻合。甲骨卜辞中有以鸣鸟为不祥的记载,《左传》襄公三十年,“鸟鸣于亳社,如曰:‘嘻嘻’。甲午,宋大灾”。证明殷之后人宋国人,仍以鸣鸟为不祥之兆。这说明《高宗彤日》篇有其原始的史料依据。但是文中提到的“王司敬民,罔非天胤”的民本观念,郭沫若认为在古时是不可能有的。另外篇中所见“民”“德”等用语和以“天”为至上神的观念都非殷人所有,可能是东周时写定的。

《西伯戡黎》是记周文王征服了商王国西北部的藩屏黎国之后,商王朝的亡国之祸迫在眉睫,大臣祖尹对殷纣王的训诫。《微子》则是宗室贵族微子在商朝行将败亡之际向太师、少师讨教个人对策的一篇对话。这两篇文献大概都是根据了当时留下的原始材料,但从内容和称“商”为“殷”等用语看来,当写成于春秋时代。

《诗经·商颂》是一组较早的文献史料。主要内容是歌颂商之先祖的诞生和商汤的武功,是殷的后人宋国人祭祀殷祖的诗篇。《商

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颂·长发》“有娥方将，帝立子生商”。意思是说，上帝想立子，就命玄鸟降至人间，使有娥氏生下了商的始祖。这些神话诗篇是关于商族起源的最早的史料。

除此之外，《左传》、《国语》、《竹书纪年》、《世本》以及周秦诸子，虽都是战国及其以后的作品，但是其中也都保存了一些有关商代的零星史料，也是不可忽视的。

《史记·殷本纪》是记述商殷历史最为系统详细的文献。汉代的司马迁在选择史料时，态度是比较严谨的。他撰述此篇时，主要的根据是《商书》和《商颂》，所谓“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后来经过王国维的研究，将甲骨文中记载的先公先王的名号与《殷本纪》联系起来考察，证明《殷本纪》所记述的殷王世系，基本上是真实的^①。从此，商代历史才成为无可争辩的信史。《殷本纪》虽成书较晚，但记述的内容多有较早的史料根据，因此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综上所述，我们所能见到的有关商殷历史的文献史料甚少。而甲骨文的被认识，是关于商代史料的空前惊人的大发现，使商代史料缺乏的情况大大改观。

河南安阳西北五里的小屯村，是殷朝故都所在，后来称为“殷墟”。很久以前，当地农民犁田时就不断发现有刻辞的甲骨，他们作为药材卖给药店，称作“龙骨”。有字的往往被刮去，有的骨头被碾成细粉做“刀尖药”出售，用以止血。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在北京做官的王懿荣在用药前审视药物时，偶然发现了这种刻在“龙骨”上的文字。王氏本为金石学家，精研铜器铭文和古文字。他立即派人往药店买来了全部字骨，访明来历，并继续搜求，使三千多年前的古文字，受到了应有的重视。这种古文字，就是甲骨文。

甲骨文是自盘庚迁殷至纣灭亡二百七十多年之间，殷王室贵族进行占卜的遗物。殷人是非常迷信的，大至祭祀、战争，小至疾病、梦幻都要占卜。每逢癸日要卜旬，每晚要卜夕。占卜用龟的腹甲、背甲或牛的肩胛骨，在骨的反面整齐地施以钻凿，用时向凿处加火灼之，另一面就破裂成兆纹，根据卜兆判断吉凶。卜完之后，他们将所问的事和占验的结果刻在卜兆之旁。一条完整的卜辞包括叙辞（记卜问

^①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见《观堂集林》卷九。

的时间和贞人的名字)、命辞(记向卜龟提出的问题)、占辞(记根据卜兆所作出的吉凶判断)、验辞(记占卜之后应验的事实)。除卜辞外,还有少量的记事刻辞,在记事刻辞中数量最多的是关于入龟和攻治卜用甲骨的记录^①;还有一些人头刻辞、鹿头刻辞、牛头刻辞、虎骨刻辞等,记载了捕捉战俘或猎取野兽的战果,作为战利品用于向祖先献祭。就目前已发现的甲骨而言,甲骨文字有四千个左右^②,已识字在一千以上。甲骨刻辞的内容涉及殷人的经济生产、政治军事活动及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如农业、畜牧、田猎、阶级关系、军队、监狱、战争、方国、鬼神崇拜、天文历法、气象、建筑、医学等。

从1899年发现甲骨文至今,已有百年。出土甲骨文十多万片^③,其中包括民间私藏传世的甲骨和解放前中央研究院及建国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学发掘的甲骨。这些甲骨,凡有文字的都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科学发掘所获,由于有明确的地层和同出的器物,其史料价值更高;同时,考古发现的陵墓、建筑遗址、遗迹和其他出土古物,对于甲骨文和商史研究也都具有重要意义。

出土的甲骨实物,绝大部分都保存在国内,广布于中国内地四十多个城市的九十多个单位,以及台湾和香港。有少部分流落到国外,包括日本、加拿大、英国、美国、德国、俄罗斯、瑞典、瑞士、法国、比利时、新加坡、韩国等十二个国家。国内外所藏的甲骨,内容重要的,绝大多数都已发表。从1903年第一部甲骨文著录书——《铁云藏龟》问世以来,目前国内外著录甲骨文资料的书刊已达二百余种^④。

甲骨文著录书的不断出版,为研究商代历史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但是甲骨文不是殷代唯一的文字,而只是殷代应用文字的一种。殷代的应用文字,大部分应该是刻写在“典”“册”之上的(如前所述),此外殷人还常在陶器、石器、玉器、骨角器等各种器物上刻写文字,陶文内容以单字为多,多是陶器烧前刻在器物口沿、肩部、腹部、足部等部位。除河南殷墟以外,江西清江、河北磁县下七垣、藁城

① 郭沫若《殷契粹编》第1534片考释。科学出版社1965年版。参见齐文心《历组胛骨记事刻辞试释》,刊《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

② 沈建华、曹锦炎编《新编甲骨文字形总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③ 关于甲骨文的总片数,说法不一。参见胡厚宣:《八十五年来甲骨文材料之再统计》,刊《史学月刊》1984年第5期。陈炜湛:《关于殷墟甲骨文的两个基本数字》,刊《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3日第7版。

④ 见宋镇豪主编:《百年甲骨学论著目》,语文出版社1999年。

台西村、邢台曹演庄、河南郑州二里冈等商代遗址和陕西周原都发现陶文。内容为数字或符号、族名、人名、记事、卦辞等^①。商代有铭文的玉石器近百件,字迹可辨认的约30件,主要出土在安阳殷墟。玉石文字多为契刻,少量是书写的。玉石文字内容简短,主要为族名,祖先名、卦辞或涉及战争、祭祀、赏赐等文字^②。比较陶文、玉石器、骨角器铭文而言,铜器上的铭文内容较重要,数量也较多。因此,殷商铜器铭文(一般称为“金文”)也是有关商史的重要资料。

早在北宋末年,有关商周古器的专门著作就有十几种。这些书多摹有图像、铭文,并对器名、文字作了考释,有的还注明出土地点或藏家。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是吕大临的《考古图》。该书著录了四件殷代铜器:乙鼎、兄癸卣、足迹罍、亶甲觚,并注明得于“邲郡亶甲城”或“亶甲墓旁”。所谓“亶甲城”或“亶甲墓”,都指“殷墟”所在。宋人把“邲”当成了河亶甲所都的“相”,因此以殷墟为“亶甲城”。此外,在王黻等《博古图录》、王俅《啸堂集古录》、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等书中,也都录有商器,可能是宋代殷墟出土之物。

清代中叶以后,金石学获得进一步发展,著作繁多,其中有关商周时期的著录不下百种。如:吴式芬《捃古录金文》著录了戊辰彝、庚申父辛角、般甗等商器,而且摹刻精善,在木刻金文中为最佳者。近人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收殷周4831器,凡传世铭文大致完备,搜罗宏富,鉴别精审,印刷精良。其中所收“文父丁簋”(8.33.2)、“乙亥父丁鼎”(4.10.2)、“毓祖丁卣”(13.38.6)等都为商器。罗氏所著《殷文存》和王辰的《续殷文存》收器虽然不少,但除著名的“戊辰彝”等数器外,多属周代器物,不足据。

民国以后,殷墟古物大量被盗掘,市面散见甚多。北京尊古斋古董商人黄浚,将他经手收售的器物辑成《邲中片羽》三集,所收铜器除“蟠螭钟”形制较晚为周器外,其他都可认为殷墟遗物。在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殷代陵墓发掘报告未出之前,此书为研究殷代铜器中比较重要的资料。

抗战前中央研究院在小屯发掘殷代陵墓,出土了一大批有铭铜器,仅1934年10月至1935年1月第十次发掘,就出土了成形铜器

① 刘一曼《殷墟陶文研究》,刊《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② 陈志达《商代的玉石文字》,《华夏考古》1991年第2期。

124件,完整的在半数以上,精品27件。这批铜器不仅数量大,而且都是通过近代科学考古方法发掘出来的,史料价值比较高。对这些殷人遗物的研究,使我们获得了鉴别殷代铜器的可靠标准。

建国以来,考古工作飞跃发展,取得一系列可喜的成果。1969年5月至1977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殷墟发掘了九百多个殷代墓葬,出土大批铜器,其中有铭铜器43件,多为族名金文,每器铭文一二个字,不同的图文近二十种,是研究殷代族氏的重要资料^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76年所发现的“妇好墓”,获青铜器近二百件,而且许多器上铸有“妇好”铭文。这些铜器属武丁晚年至祖庚、祖甲时期^②。

此外,在山西、陕西、湖北、湖南、安徽、山东、四川等地也陆续发现殷商时期的有铭铜器^③。这些地区距离商王朝政治中心较远,应属于当时的诸侯封国地区。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陆续出版了关于殷周金文的大型汇编——《殷周金文集成》共十八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纂,中华书局出版。所收铭文的时限是从商殷、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截至秦统一以前,铜器采自宋代以来各公私藏家、海内外主要博物馆和各地新出土或采集的有铭铜器。经去伪存真,分类整理,共发表有铭铜器一万三千多件,铭文近十万字。商代有铭铜器尽在其中。资料的采集截至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释文》六卷,2001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张亚初历六年完成了《殷周金文集成引得》,2001年中华书局出版,归纳出金文字头4972个,为使用《殷周金文集成》这部巨型资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其后刘雨、卢岩编著《近出殷周金文集录》全四册,中华书局出版,对1985年以后新获的有铭铜器做了补充。

殷代铜器铭文多比较简短,以一字至五六字最为常见,记作器者的族氏和为某人作器。作器的原因以祭祀、赏赐为多。铭文最长亦无过五十字者。

和十多万片甲骨文比较,殷金文和其他铭刻数量少,内容所涉及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② 李学勤《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文物》1977年第11期。

③ 参看考古研究所编《三十年来出土的殷周有铭铜器简目》,1978年油印本。

的方面也有限。所以甲骨文对研究商代历史来说,无疑是最直接最重要的史料,也是最丰富的宝库。下面仅就已著录的甲骨文史料,按“传世甲骨文的著录书”、“科学发掘的甲骨文”和《甲骨文合集》三个部分择要介绍。

第二节 传世甲骨文的著录书

甲骨文被发现以后,由于民间私掘和古董商人的收售,使甲骨大量地流散于世间,其中有一部分还被盗运国外,使我国的宝贵文物遭到严重损失。这时有一批早期的甲骨学家如刘鹗、王襄、罗振玉等和后来的甲骨学家胡厚宣等,努力搜求甲骨并著录成书,为甲骨文史料的收集和流传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为了与科学发掘的甲骨文相区别,我们称这些非科学发掘的甲骨文为“传世的甲骨文”。传世的甲骨文著录书共有六十多种,现择要分组介绍如下。

(甲)早期的甲骨文著录书

甲骨文的第一部著录书是《铁云藏龟》,著者刘鹗,字铁云,江苏丹徒人,通晓算学、医学、治河等学问,曾参与治理黄河,颇著声誉。又曾向清政府建议借外资兴办实业,不得志。此后,以私售仓粟罪流放新疆,逝于迪化(今乌鲁木齐)。晚年曾著小说《老残游记》。刘氏嗜金石考古之学,曾投古文字学家吴大澂门下,为甲骨的早期收藏家之一。他所藏甲骨的来源,得自王懿荣之子王翰甫千余片,定海方药雨三百余片,此外还有在山东、河南、河北一带购买的四千余片,总共收藏在五千篇以上^①。刘氏竭半载之力,从中挑选 1058 片,编成《铁云藏龟》六册,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由抱残守缺斋石印出版。

《铁云藏龟》的原刊本有罗振玉序、吴昌绶序和刘氏的自序。另外又有吴、刘二序本,还有一种无序本,仅题“抱残守缺斋所藏三代文字第一”,这种本子流传较广。以上三种,除序互异外,其他版式皆同。此书拓片墨色不佳,印制欠精,因而字迹模糊。1931 年上海蟬隐庐翻印二序本,后附《铁云藏龟之余》,合为六册,每片之旁附有鲍鼎的释文。该书许多拓片用白粉描过,字迹失真,且多错描,误释亦多,

^① 《铁云藏龟》自序。董作宾、胡厚宣《甲骨年表》,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

无参考价值。

《铁云藏龟》为开创之作,编排无一定标准,而且混入五片早期镌刻拙劣的赝品(57.1、84.1、130.1、254.1、256.1),这是由于当时认识水平的限制。刘鹗断定甲骨卜辞为殷代文字,提出了“以天干为名,实为殷人之确据”的论断,这是正确的。但是刘鹗当时只认出了四十余字,其中包括十九个干支字和两个数字,对甲骨卜辞本身的内容尚缺乏认识,只对几条卜辞作了极初步的解释。尽管如此,本书著录的材料却是很有价值的。卜辞多属武丁时期,有关于祭祀、战争、方国、祖先、人物、上帝、神祇、求年、求雨、卜旬、卜夕等多方面内容,为后来的研究者不断征引。

《铁云藏龟》问世后一年,孙诒让根据该书写成了第一部甲骨文的研究著作——《契文举例》。孙诒让,浙江瑞安人,晚清著名经学家,同时又是一位有素养的古文字学家,自称“治古文大篆之学四十年,所见彝器款识逾两千种”^①。孙氏见到《铁云藏龟》,欣喜异常,“穷两月力校读之,以前后重复者参互采绎,乃略通其文字”^②。他主要采用与金文比较的方法认出了一百八十多个字,而且多为基本的常用字,这样就为识读甲骨卜辞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同时,他将《铁云藏龟》所著录的史料按事类分为十章:日月第一、贞卜第二、卜事第三、鬼神第四、卜人第五、官氏第六、方国第七、典礼第八,文字第九,杂例第十。这是甲骨文分类研究的雏形。

孙氏的《契文举例》处于甲骨文研究的草创时期,由于所见到的材料有限,卜辞未能通读,不能在卜辞的语句中求通字义,他作出的一些结论就难以成立了。加之《铁云藏龟》印制欠佳,因而误释很多,如:释“王”为“立”,以“贞”为“贝”,视“河”为“人乙”,误“告”为“吉”等,比比皆是。《契文举例》与孙诒让的其他著作相较,显得粗疏。虽然如此,孙氏的草创之功还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刘鹗死后,1915年,罗振玉从刘氏所贻墨本中选出《铁云藏龟》所未刊者40片,编成《铁云藏龟之余》。原本墨拓甚精。这批材料后来又收入罗氏《殷虚书契续编》。

上海英籍犹太人哈同的妻子罗迦陵得到刘鹗旧藏千片。“其中

① ② 孙诒让《契文举例》自序,上海蟪隐庐石印本。

见于《铁云藏龟》者十之一二,而未见者十之八九。乃复选其优者”^①编成《戡寿堂所藏殷虚文字》(简称《戡》),共著录甲骨 605 片。书题睢宁姬佛陀类次,实出王国维之手。王氏在《随庵所藏甲骨文字序》中曾提到:“丙辰丁巳间,铁云所藏一部归于英人哈同氏,余为编次考释之。”^②《戡》于 1917 年由上海仓圣明智大学石印出版,编入《广仓学窘丛书》《艺术丛编》第三集。1918 年又刊单行本,与王国维所作考释合为二册。单行本印制较精。王国维所作诸条考释,灌注了他对甲骨文专题研究的心得。《戡》书内容重要,材料丰富,内中有几条卜辞构成了王氏所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的主要论据。王氏的名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以甲骨卜辞考订了古文献的史料价值。他在《古史新证》^③中指出:由于地下材料的出土,“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以地下出土的甲骨卜辞,与文献材料相印证,以发明商代的历史,是王国维特别提出的“二重证据法”。

《戡》1.10 与《后》^④上 8.14 为一骨之折,由王国维发现并加以缀合,据以纠正《史记·殷本纪》的先公先王次序,是为甲骨缀合之始。后来董作宾又将刘惠之旧藏一片与此两片拼合。三片缀合的摹本著录于《卜辞通纂》的《书后》页 2,拓本著录于《殷契粹编》112 片。三片缀合后的卜辞是:

乙未酒馐品,上甲十、报乙三、报丙三、报丁三、示壬三、示癸三、大乙十、大丁十、大甲十、大庚七、小甲三……三,且乙……

上甲六示在《史记·殷本纪》中的次序是:上甲、报丁、报丙、报乙、主壬、主癸。王国维根据卜辞的先公先王次序校正《殷本纪》“三报”的次序应是:报乙、报丙、报丁,数千年来史籍中的错误得到廓清。王国维的这一发现,成为甲骨学中著名的一例。

此外,《戡》3.3 对甲骨文“后”字的考证,《戡》1.1、1.2 之“土”,《戡》1.3 之“王亥”,《戡》1.4 之“高祖亥”,《戡》1.5 之“上甲”,《戡》3.4 之“中宗祖乙”等考释中都有重要发明。

《戡寿堂所藏殷虚文字考释》为甲骨文著录书附考释之始,此后

① 《戡寿堂所藏殷虚文字》序。

② 王国维《随庵所藏甲骨文字序》,载《观堂别集》卷四。

③ 王国维《古史新证》,1934 年北京来薰阁书店影印王氏稿本。

④ 《殷虚书契后编》简称《后》。

出版的诸种著录书亦多附有考释。

著录刘鹗旧藏甲骨的书还有叶玉森的《铁云藏龟拾遗》。叶氏所得共 1300 版,选其中 240 版编成《拾遗》,均为《铁云藏龟》和《铁云藏龟之余》所未录者。后附释文合为一册,1925 年上海五凤砚斋石印出版。又有富晋书社重印本。书中著录的甲骨卜辞有关于人祭、邑内骚乱、战争、封侯、田猎、疾病和人龟等项内容。

旅居我国的美国人福开森(John C. Ferguson)也得到一部分刘鹗的旧藏甲骨,后经商承祚选拓编成《福氏所藏甲骨文字》,并作考释。全书共著录 37 片,1933 年 4 月由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影印出版,书后附董作宾跋。董氏根据他的分期标准对全书的材料作了分期分类。第一期武丁时期有祭祀、征伐、狩猎、疾病、风雨、卜旬、杂卜、骨白刻辞等项内容;第三期廪辛、康丁时期有祭祀、卜旬;第五期帝乙、帝辛时有田游。

刘鹗旧藏的一部分又归于商承祚,商氏选拓六百多片又加上所收集的其他各家所藏共 1000 片编入《殷契佚存》(简称《佚》)。其中《佚》255 至 316,共六十二片,为燕京大学教授美国人施美士(Ernest K. Smith)藏,多数是第三期康辛、康丁时的卜辞。施氏旧藏的《佚》256 与前中央研究院第三次发掘出土于大连坑西南的《甲》^① 2282 可合,拼合片为《佚》986。此片是董作宾拼合的,后又著录于《殷墟文字缀合》51 和《甲骨文合集》27456,是第四期卜辞。此片的拼合,可确证施氏旧藏甲骨出土于大连坑一带。这片甲骨上面载有:上甲、大乙、大丁、大甲、大庚、大戊、中丁、祖乙、祖辛、祖丁十示直系先公先王。

施氏死后,他所藏的甲骨由他的遗孀捐赠给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这批材料后来又由周鸿翔著录在《美国所藏甲骨录》的哥伦比亚大学所藏部分内(《美》414—477 片)。

《佚》518 正、反,为著名的“宰丰骨”,一面镂刻花纹,另面刻有文字,这是帝乙、帝辛时期殷王田猎捕获野兽之后,赏赐臣下及进行祭祀的记事。

王襄也是一位早期的收藏家,他的收集活动大约和王懿荣同时^②,所藏甲骨约四五千片之多。1925 年编成《簠室殷契徵文》一书,

① 董作宾主编《殷墟文字甲编》。

② 详胡厚宣《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商务印书馆,1951 年。